

论步骛及其家族人物对孙吴政局的影响

王永平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 步骛作为临淮淮阴步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东汉末年避难江东, 饱尝艰辛。后来进入孙权幕府, 建安十五年, 步骛受命领兵入交州, 为孙吴开辟疆域; 任职荆州, 不断举荐士人, 反对孙权重用校事吕壹。孙权步夫人“宠冠后庭”, 孙权屡欲立其为后, 引起统治集团上层的激烈纷争; 其女全公主凭依孙权的支持, 暗中操纵了“二宫构争”等一系列政治斗争。

关键词: 孙吴; 淮阴; 步骛; 步夫人; 全公主

中图分类号: K 23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06)01-0085-07

孙吴立国虽以江东为核心区, 但其兴亡与江淮地域的关系特别密切, 其政权中不少文武俊杰皆来自淮南北地区。汉末军阀混战不断加剧, 江淮地区受到严重的威胁, 当地人民纷纷渡江避难, 这其中包括一些豪强和文士, 有的还携其家族南来, 成为江东的流寓人士。当时江淮人士比较集中地流寓江东,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地缘关系, 江淮地域距江东较近, 避乱江东比较便利, 特别是那些携家族南迁者, 更是如此; 二是由于孙氏父子长期在这一地区活动, 与当地人士结成紧密联系。就中心城市而言, 如淮北之彭城、江北之广陵等地的流寓士人数量相对较多、影响较大, 也比较受重视。处于两地之间的临淮淮阴是淮河流域的重镇, 处于南北军事对抗的关键地带, 其地也有人流移江东, 对孙吴政权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其中最为突出者当推淮阴步氏之步骛一支。

一、步骛在孙吴的活动及其文化性格

据《三国志》卷52《吴书·步骛传》, 步骛

(? ~ 247) 字子山, 临淮淮阴人, 是孙权主政时期一位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人物, 参与了诸多重要的军政大事, 位至丞相。下文对其在江东的际遇及其影响略作论述。

1. 对淮阴步氏门第的蠡测及步骛性格的文化特征

关于临淮淮阴步氏之家族渊源及其门第, 《三国志·吴书·步骛传》注引《吴书》: “晋有大夫杨食采于步, 后有步叔, 与七十子师事仲尼。秦汉之际有为将军者, 以功封淮阴侯, 骛其族。”查考《元和姓纂》等姓氏、谱牒方面的著作, 追溯淮阴步氏族源, 皆本于此, 可以大致推测淮阴步氏是秦汉之际因军功受封徙居此地的, 其后代则定居下来。不过, 这一家族的具体发展状况如何, 则少有记载。步氏进入正史, 是三国时期的步骛及孙权步夫人步练师, 但都没有明确记载其门第。《步骛传》载“世乱, 避难江东, 单身穷困”, 《孙权步夫人传》则载其与骛同族, 因乱随母避难庐江, 成为孙策俘虏。这表明步氏流动都是以小户为单位, 家族意识及其势力比较薄弱,

收稿日期: 2005-06-20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3SJD770001)

作者简介: 王永平(1962-), 男, 江苏南京人,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汉魏六朝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这在越来越强调门户的汉末社会，应当属于地方性的小族，用当时人的标准可视为“单家”，不能算作世家大族。

当然，步氏家族的一些房支开始儒家化，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步骛初渡江，生活极为困苦，但他依然能够保持士人的品格。对此，《三国志》本传载：“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他后来虽位至孙吴丞相，但依然保持着儒生的品节：“赤乌九年，代陆逊为丞相，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注引《吴书》载：“骛博研道艺，靡不贯览，性宽雅沈深，能降志辱身。”从当时情况看，这是很不容易的。关于步骛初渡江的生活状况，本传有一段记载：

会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纵。骛与（卫）旌求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征羌方在内卧，驻之移时，旌欲委去，骛止之曰：“本所以来，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为高，祇结怨耳。”良久，征羌开牖见之，身隐几坐帐中，设席致地，坐骛、旌于牖外，旌愈耻之，骛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肴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骛、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骛极饭致饱乃辞出。旌怒骛曰：“何能忍此？”骛曰：“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

焦征羌是当地土豪，缺乏文化修养，对流寓人士较少同情心。步骛等人“求食其地”，不得已委曲求全。由步骛所谓“吾等贫贱”一语，其生活之困窘和内心之苦衷当不难想见。卢弼《三国志集解》卷52《步骛传》于此条下有案语云：“此真饱经世态、识透人情之语，大有韩信忍辱胯下之风，同产淮阴，习闻有自，迨斩徇吴巨，宾服南土，又与韩信之国士无双，一军皆惊者何异？”作为出身“单家”的寒士，他们既得不到朝廷命官的护佑，也得不到当地土豪的尊重，只能一度为人佃客。

即便生活如此艰难，步骛等游士还是相互结交。步骛与广陵卫旌“以同年相善”自不必谈，《三国志》骛本传注引《吴书》又载其“与琅邪诸葛瑾、彭城严俱游吴中，并著声名，为当时英俊”。诸人是张昭之后孙吴侨寓文士中的主要

代表，对军政大局有重要作用。他们始终相互扶助，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和合作关系，这是与他们早年流落江东的经历有关的。据《三国志》骛本传，颍川周昭著文评论他们的品格、气质，他引用《论语》的话说：“‘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步骛）履之矣。”陈寿在《三国志》卷52传末有“评”云：“诸葛瑾、步骛并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所谓“德度规检”，正是指其品德与节操。由此可见，步骛作为流寓江东之儒学士人，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依然保持着士人的风范和尊严。

2. 步骛征服、安抚交州及其意义

步骛在江东生活状况和仕途的变化是在孙权主政之后。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其死前遗言孙权调整政策，注意“举贤任能”。孙策自献帝兴平末年渡江后，主要致力于军事征服，不仅对江东本土世族采取“诛戮英豪”的政策，而且对流寓人士也未大力提携，以致孙策死时，出现了“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的情况。据《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在张昭、周瑜等人的辅助下，孙权“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步骛等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孙权幕府的。《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注引《傅子》：“及权继其业，有张子布以为腹心，有陆议、诸葛瑾、步骛以为股肱，有吕范、朱然以为爪牙，分任授职，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至于步骛之具体职务，本传载：“孙权为讨虏将军，召骛为主记，除海盐长，还辟车骑将军、东曹掾。”建安年间，步骛主要的军政业绩是初步平定交州。

交州地区虽相对偏僻，但汉末以来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不仅当地的土豪屡生裂隙，制造割据；而且曹操、刘表等外来势力都参与对交州的争夺，导致这一地区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孙权在赤壁之战后也开始用兵交州，打通对南方地区的交通门户，扩大其生存空间。据《三国志》卷49《吴书·士燮传》，士氏为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交州著姓，自两汉之际以来，世代仕于州郡，士燮曾游学洛阳，官至交趾太守。汉末，曹操以汉献帝之名任命的交州刺史是朱符，符为“夷人所杀，州郡扰乱”，士燮表其弟壹为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领九真太守，弟武领南海太守。这样，士氏兄弟同为四郡太守，

“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喻也。”士燮本为经生，精于《春秋左传》，为之作注，“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形成了交州地区社会稳定、学术繁荣的局面。这样，交州地区实际上控制在士氏家族手中。但建安八年（203）曹操命张津为交州刺史，张津迷信道术，为其部将区景杀害。刘表趁机派遣赖恭代张津为交州刺史，以吴巨为苍梧太守。但二人不协调，互相争夺，削弱了刘表在交州的势力。曹操则顺水推舟，任命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使其获得了合法控制交州的地位。

赤壁之战后，刘表父子的荆州势力已不复存在，曹操则暂时退出了对江南的争夺。这给孙权提供了机会。建安十五年（210），孙权命步骘征交州，其骘本转载此事曰：

建安十五年，出领鄱阳太守。岁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节、征南中郎将。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阴怀异心，外附内违。骘降意怀诱，请与相见，因斩徇之，威声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宾，自此始也。

这里概括地记述了步骘夺取交州的过程。根据有关记载，在这一过程中，步骘文武并用，加强对交州的控制。所谓武，就是对一些反抗势力予以坚决打击。《三国志集解》卷52注引《交广春秋》载步骘入交州，仅有将吏400人，苍梧太守吴巨“拥众五千”，力量强大，骘“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区景，步骘加以分化，并寻机将二人处死。又载：“骘杀吴巨、区景，使严舟船，合兵二万下取南海。苍梧人衡毅、钱博宿巨部伍，兴军逆骘于苍梧高要峡口，两军相逢，于是遂交战。毅与众投水，死者千有余人。”钱博逃亡，到吕岱时归降。这样，步骘以少数兵力入岭南，经过艰苦的军事斗争，基本上控制了交州的局势。

另一方面，步骘也认识到，要长期稳固统治，仅依靠武力征服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利用当地大族特别是士氏的影响。《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

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燮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骘

斩之。权加燮为左将军。建安末年，燮遣子入质，权以为武昌太守，燮、壹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将。……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壹时贡马凡数百匹。权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慰之。

士燮对孙权的归附，主要是步骘从中发挥了联络、沟通的作用。这样，自建安十五年至孙权黄武五年（226）的十多年时间里，步骘一直镇守交州，改变了岭南地区自汉末以来的混乱局面。当然，与后来吕岱对交州的控制相比较而言，步骘的管理带有羁縻之道的性质，士燮家族享有“半自治”的特权。步骘这样做，不仅仅体现出其个人的从政态度，而主要反映出当时孙吴的国力及其相关政策。总的说来，步骘占有交州，是孙吴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他不仅拓展了孙吴的疆域，而且打通了孙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联络南洋及其他地区的道路。后来吕岱不断派使节到东南亚地区，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尽管这一业绩并非在步骘手中完成，但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他的作用是不应漠视的。

3. 举荐士人，劝谏孙权

建安后期，孙权将主要精力用于荆州的争夺，并图谋称王。220年，孙权征步骘至长沙，骘领兵万人，震慑零陵、桂阳等地的夷蛮势力。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于武昌，骘进位骠骑大将军，都督西陵，与陆逊共同主持荆州上流的军政。不久，孙权回建业，留下太子孙登，并以陆逊为太傅，教导太子。应该说，陆逊是当时荆州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当时荆州不仅军政地位重要，而且孙权留下了大量的文武僚佐。孙权返都建业，荆州士人的升降难免受到影响。这不仅关系到个别士人的地位，更关系到孙吴用人政策改革等重大问题。其实，自黄武年间以来，江东世族代表人物陆逊等人便不断要求孙权排斥佞小，重用儒学士人，减缓刑罚。孙权虽表面应付，但内心里，他崇尚法术之治，不断强化专制集权。这样，荆州的陆逊与建业的孙权之间便存在着政治观念和具体政策的分歧。孙吴的政治斗争及其性质问题极其复杂，其集团内部既有寒门与士族的分别，也有南、北地域的差异，其间往往相互作用，难以简单分别。在黄武、黄龙年

间，孙吴政权进入“江东化”的高潮阶段，南北人士在推进孙权政治改革方面颇多一致。具体说到步骛、诸葛瑾等北人，孙权将他们留在荆州，自然想利用他们限制和分割陆逊的权力，但他们在劝说孙权进用士人的问题上则与陆逊一致，这是他们共同的文化立场所决定的。《三国志》步骛本传：

时权太子登驻武昌，爱人好善，与骛书曰：“夫贤人君子，所以兴隆大化，佐理时务者也。受性暗蔽，不达道数，虽实区区欲尽心于明德，归分于君子，至于远近士人，先后之宜，犹或緬焉，未之能详。《传》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斯其义也，岂非所望于君子哉！”骛于是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诸葛瑾、陆逊、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卫旌、李肃、周条、石干等十一人，甄别行状，因上疏奖劝曰：“臣闻人君不亲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不下堂庙而天下治也。齐桓用管仲，被发载车，齐国既治，又致匡合。近汉高祖揽三杰以兴帝业，西楚失雄俊以丧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寝谋；邳都守边，匈奴窜迹。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于汉北，河、洛之宾尚有僭逆之丑，诚揽英雄拔俊任贤之时也。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

这里，太子孙登向步骛了解“远近士人先后之宜”，希望他能对诸人品格、才能有所评议。步骛明确指出君子治国必须重用贤德之人，其乃“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认为孙权应抓住时机，“揽英雄拔俊任俊”。从步骛所“甄别行状”的11位人物看，他们多是任职荆州的儒学士人的代表。其实，步骛举荐士人非一时冲动，而是他一贯的政治态度。其本传又载：“骛前后荐达屈滞，救解患难，书数十上。权虽不能悉纳，然时采其言，多蒙济赖。”所谓“荐达屈滞”，就是推荐被埋没的士人。

自黄武年间以来，孙权对儒学士大夫地位的上升深感忧虑，于是驱使一些亲信小臣干政，特别是效仿曹魏，推行“校事”制度，专门监督、打击朝臣士大夫，进一步强化孙吴皇权。这一状

况到黄龙、嘉禾年间越发严重，以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大将军朱据等人都受到诬陷，并且一度实际上丧失了处理军政事务的权力。《三国志》卷52《吴书·顾雍传》载：“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吕壹等为小吏，之所以如此胡作非为，完全在于其背后有孙权作支撑。在这一斗争中，步骛受迫害的具体情况缺乏记载，但他的态度与陆逊等人基本一致。据《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赤乌元年（238），在广大儒学朝臣的激烈反对下，孙权不得已诛杀为害多端的吕壹，并努力与朝臣媾和。

孙权诛吕壹后，主动派使臣向诸位军政大臣解释，所谓“引咎责躬”，就是“罪己”，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但大臣们并不领情，其中包括步骛在内相互推让，实际上是对孙权重用吕壹的抗议。其实，在吕壹专权横行期间，步骛便一再上疏进谏，表达了对孙权的不满。《步骛传》：

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骛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摘抉细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是以使民踣天踏地，谁不战栗？昔之狱官，惟贤是任，故皋陶作士，吕侯赎刑，张、于廷卫，民无冤枉，休泰之祚，实由此兴。今之小臣，动与古异，狱以贿成，轻忽人命，归咎于上，为国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为亏，甚可仇疾。明德慎罚，哲人惟刑，书传所美。自今蔽狱，都下则宜谘顾雍，武昌则陆逊、潘濬，平心专意，务在得情，骛党神明，受罪何恨？”

这是步骛为顾雍、陆逊等人开脱。所谓“骛党神明，受罪何恨”，表明步骛与诸人为同党，只要诸人得到任用，他宁愿自己被误会甚至遭到迫害，也心甘情愿。又上疏云：

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忧深责重，志在竭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国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此三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成福欺负所天乎？这里称顾雍、陆逊等为“社稷之臣”，进一

步为他们正名。不仅如此，步骛还上书批评孙权对儒学朝臣的监察及其相关制度：“窃闻诸县并有备吏，吏多民烦，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缘衔命，不务奉公而作威福，无益视听，更为民害，愚以为可一切罢省。”据《三国志》《吴书·步骛传》、《宋书·五行志》、《晋书·五行志》等资料记载，步骛还不断地以天象的灾异情况指斥校事的胡作非为，前后凡上书五、六通。正是由于步骛等人的一再进谏，孙权终于觉悟，遂下令捕杀吕壹等校事官。步骛在校事横行的背景下，敢于直言不讳地陈述自己的看法，为儒学朝臣洗刷罪名，痛斥校事的罪孽，表现出其士人的品格。

孙权赤乌年间，步骛参与的另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是由孙权立嗣引起的“二宫构争”。关于步骛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及其评价，因与孙权后宫制度及其斗争相关，故将在下文中一并论述。

二、孙权步夫人争后及其对孙吴政治的潜在影响

谈论临淮淮阴步氏在孙吴的活动，不能不涉及及吴主孙权之步夫人。关于步夫人的情况，《三国志》卷50《吴书·嫔妃传》：

吴主权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骛同族。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于权，宠冠后庭。生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进，故久见爱待。权为王及帝，意欲以为后，而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余年，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及薨，臣下缘权旨，请追正名号，乃赠印绶，……葬于蒋陵。

由此可见，孙权之步夫人与步骛同族，“宠冠后庭”。孙权嫔妃甚多，得为夫人者也有数人，惟步氏最得宠，所载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以美丽得幸于权”；二是“性不妒忌，多所推进，故久见爱待”。据《三国志·吴书·孙权传》陈寿“评”，孙权不遵礼法，后宫制度极其混乱，长期未正式立后，被讥为“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正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围绕孙权立后还存在着深层的政治斗争。其实，孙权是有立后打算的，其意中之人便是步氏。但广大朝臣则多

表示反对，他们“议在徐氏”，致使孙权“依违者十余年”。徐氏何许人？据《三国志·吴书·嫔妃传》，徐氏乃吴郡富春人，“权为讨虏将军在吴，聘以为妃，使母养子登。后权迁移，以夫人妒忌，废处吴。积十余年，权为吴王及即尊号，登为太子，群臣请立夫人为后，权意在步氏，卒不许。后又疾卒。”《三国志》卷59《吴书·孙登传》也载：“初，登所生庶贱，徐夫人少有母养之恩，后徐氏以妒废处吴，而步夫人最宠。步氏有赐，登不敢辞，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赐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由这两段记载，可知孙权欲立步氏为后，受到两个方面的反对：一是朝臣，一是太子孙登。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孙登是孙权之长子，而徐氏有抚养之恩，登敬之如生母，坚决主张立之为后。儒学朝臣坚持儒家嫡长子继承制，他们支持孙登，自然也要求以徐氏为后，这符合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原则。步夫人尽管得到孙权宠爱，但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未生出儿子，她只有二个女儿，因此，她也争取孙登的支持，常赐赠给登衣物，“登不敢辞，拜受而已”，完全出于礼节，实际上敬而远之，从而使步氏无可奈何。至于朝臣赞同徐氏，反对步氏，恐与步氏为江北人，而徐氏为江东人有关，反对步氏者当多为江东儒学大族人物。毕竟，孙吴一代始终存在着南北人士地域间的对抗和斗争。在步氏争后的过程中，步骛的态度如何呢？对此，史无明书，但可以肯定地推测：步骛从家族本位考虑，他支持孙权立步夫人为后。而步夫人得宠，对步骛的仕途升迁是有所助益的。

步夫人于赤乌元年九月卒。不过，其影响并未消失。孙权对其女儿，特别是全公主鲁班十分宠爱，甚至在宫廷内部政治决策上，对全公主极为倚重，赤乌至太元年间发生的“二宫构争”便主要是由全公主操纵的。孙登死后，孙权立三子和为太子（次子虑也早逝）。但太子和母王夫人曾与步夫人争宠，引起全公主的嫉恨。于是，全公主一方面陷害太子和母子，一方面则劝孙权提高四子鲁王孙霸的地位，与孙和竞争继承权，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二宫构争”之局面。关于全公主对太子和母子的迫害，《三国志·吴书·嫔妃

传》：“吴主权王夫人，琅邪人也。夫人以选入宫，黄武中得幸，生和，宠次步氏。步氏薨后，和立为太子，权将立夫人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谮毁。及权寝疾，言有喜色，由是权深责怒，以忧死。”同书《孙和传》：“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和祠祭于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觐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这样，由于步夫人与王夫人之间的争后，导致全公主对王夫人及其子孙和的攻击，形成了持续十多年、对孙权晚年政局有极大影响的“二宫构争”。由此可见，从孙权后宫权力斗争的角度着眼，“二宫构争”是孙权步夫人与王夫人之间皇后地位之争的延续，而步夫人之女全公主则是导演者之一。

在这一事件中，孙吴文武朝臣发生了分化，以陆逊为代表的绝大部分朝臣支持太子孙和，而步骞则成为拥戴鲁王孙霸一党的领袖。《三国志·吴书·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

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骞、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孙权、全公主父女是倾向支持步骞一党的，目的是利用他们打击陆逊。赤乌八年，陆逊被逼气愤而死，而以步骞继为丞相，孙权的态度实在太清楚了，也说明骞在这一斗争中的表现是甘做孙权皇权的附庸，有损于儒学士人的品格。

对步骞的这一立场，历代史家多有微辞。南朝刘宋裴松之在《三国志·吴书·孙和传》中有注论云：“步骞以德度著称，为吴良臣，而阿附于霸，事同杨竺，何哉？（孙）和既正位，嫡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犹将义不党庶，况霸实无闻，而和为令嗣乎？夫邪僻之人，岂其举体无善，但一为不善，众美皆亡耳。骞若果有此事，则其余不足观矣！吕岱、全琮之徒，盖不足论

耳。”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28“《三国志·吴志·步骞传》”条说：“骞有君子之名，而二宫相构，不能守正，（步）阐之作逆，或其余殃耶！”也表示出鄙视的态度。这都是基于儒家道德观念的评价。确实，在这一问题上步骞是失节的。从具体的历史情境来看，步骞作出这一选择，也有不得已处，即其与步夫人、全公主的特殊关系，使其在“二宫构争”中放弃了士人的严正立场，与陆逊等人相左。因为，在集权专制的背景下，全公主一系一旦失利，步骞必然受到牵连。为维护家族利益，步骞甘为孙权与全公主的政治工具。赤乌九年（246），步骞继陆逊之后被孙权任命为丞相，其个人政治地位虽达到了高峰，但从当时的舆论看，其声誉却跌入低谷。

步骞的这一政治选择不仅使其个人名节受污，而且使其家族卷入孙吴统治集团内部的无谓纷争之中，最终遭到覆灭的命运。赤乌十年，骞因病而死。他在丞相位上似未发挥什么作用。步骞死后，按照孙吴世袭领兵制的特权，其子协嗣其位，“统骞所领，加抚军将军”，协死，子玘嗣，协弟阐“继为西陵都”，延续着其家族的地位。不过，经过孙权幼子孙亮和孙休的交替后，废太子孙和子孙皓终为帝。孙皓上台后，对迫害其父的政敌加以打击，步氏家族自然是其打击的对象。据《三国志·吴书·步骞传》，凤皇元年（272）八月，孙皓下令征调步阐，“阐累世在西陵，卒被征命，自以失职，又惧有谗祸，于是据城降晋”。《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载，步阐以西陵降晋，对孙吴荆州防御造成极大的威胁，孙皓令陆抗领兵镇压，“阐及同计数人皆夷三族”。步骞在汉末带领家族避难江东，但最终结局是其子、孙辈却遭到覆灭的厄运，实在是太可悲了。对此，上引何焯的评论已将两者联系起来，这是很深刻的看法。

综上所述，步骞是临淮淮阴步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汉末流移江东，后来进入孙吴政权。步骞作为侨寓人士的骨干分子，在赤壁之战后，地位不断升迁，他出任交州刺史，对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士人代表，他能够坚持士人的立场，不断荐举儒学士人，并对孙权重用校事吕壹发表批评意见。步氏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孙权步夫人，她以其姿色和性格深得孙权宠爱，权欲立之为后，引起江东朝臣及太子孙登的

反对，导致孙吴政权后期长时间的内部纷争。为家族利益计，步骧在“二宫构争”等事件中附会

孙权及全公主，丧失了士人独立的文化立场，虽得益于一时，但最终给其家族造成了覆灭之祸。

On the Influence of Bu Zhi and the Clan on the Wu Regime

WANG Yong pi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Bu Clan in Huaiyin, Buzhi took refuge in Jiangdong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t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fterwards he entered Sun Quan's Mufu (office of the commanding general). In 210AD, Buzhi led troops to enter Jiaozhou to expand the territory for the Wu Regime; when he took office in Jingzhou, he recommended scholars and was firmly opposed to Sun Quan putting Lü Yi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Sun Quan favored Concubine Bu and wished to appoint her Empress, which, however, led to intense conflicts among the upper level ruling class. Their daughter, Princess Quan, backed by Sun Quan, manipulated secretly a series of political struggles such as the fight for the position of Crown Prince between two sons of Sun Quan.

Key words: Huaiyin; Buzhi; the Wu Regime; Concubine Bu; Princess Quan

(责任编辑 子清)
